艺术介入乡村建设的多个案比较研究

王宝升，尹爱慕
（湖南大学，长沙 410082）

摘要：目的 研究艺术介入乡建案例，发掘可借鉴要素，为我国乡村建设提供经验启示。**方法** 采用多个案比较法，通过“最大化变异”原则来挑选艺术乡建案例，对比各案例的异同优劣。**结论** 从发起方式（本地人自发、外来人自发、政府邀请、第三方邀请）、艺术家角色（创作者、发起人、组织者）和目标（经济性、社会性、环境性、文化性）等方面对比分析了各艺术乡建案例，总结出了在地化、协同设计和产业化的可借鉴经验。

关键词：艺术介入；乡村建设；多个案比较
中图分类号：TB47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3563(2018)04-0226-06
DOI：10.19554/j.cnki.1001-3563.2018.04.045

A Comparison Study on Art-driven Rural Construction Cases

WANG Bao-sheng, YIN Ai-mu
(Hunan University, Changsha 410082, China)

ABSTRACT: It aims to study the art-driven rural construction cases, explore the applicable elements and provide the enlightenment for our rural construction. The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of various cases are compared based on the principle of "maximization of variation". Based on the case comparison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case origin (spontaneity of the locals, spontaneity of outsiders, government invitations, and third party invitations), the role of artists (creator, sponsor and organizer), and objective (economy, sociality, environment, and culture), applicable experience can be summarized as follows: localization, co-creation and industrialization.

KEY WORDS: Artistic intervention; rural construction; case comparison

乡村建设主要有城市化模式和乡土新农村模式两种，目前前者占据主导位置[1]，但非农化降低了农村低能耗生活方式对危机的弹性处理能力[2]。2013 年 12 月《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文件提出要让居民“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指明了当代乡土新农村建设的方向。在诸多学科参与的当代乡村建设热潮中，艺术介入以其理想情怀、创造力和介入方式多样性独树一帜。

1 乡建溯源与艺术介入

乡村建设在中国有着百年历史。最早的实践始自晚清河北米氏父子在定县翟城村开展的“村治”运动，包括公民教育和地方自治[3]。到 20 世纪 2、30 年代，以救活农村为主旨的乡建团体多达 600 余个，实验地达 1000 余处[4]。比如以梁漱溟为代表的“邹平模式”，着力于创办乡学，培养团体精神；晏阳初的“定县模式”，从农民的“愚、穷、弱、私” 四大病症切入；卢作孚的北碚模式注重发展实业。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实行乡村社会主义改造，改革开放后更多的是“自上而下”式地推行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核心的乡建路线。到了 21 世纪，以民间为主的“自下而上”式的乡建运动涌起，如乡村教师郑冰探索“蒲韩乡村社区”

收稿日期：2017-02-07
基金项目：湖南省科技计划社会发展领域重点研发项目（2016SK2012）；湖南省教育科学“十三五”规划课题（XJK016QTW001）
作者简介：王宝升（1984—），男，山东人，博士，湖南大学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设计创新驱动的地域振兴、社区营造、社会创新、文化遗产数字化创新等。

自组织发展模式，为农民提供经济服务和文化教育；温铁军在河北翟城村设立“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从事农民帮扶活动；石嫣创办“小毛驴”市民农场，推动社区支持农业（CSA, Community Supported Agriculture），促进城乡互动。

艺术介入乡建实践在国内近 10 年来才兴起，相关研究比较匮乏且滞后于实践，最近几年有渐增之势。目前研究大多对个案进行分析，较少进行多案例比较。本文从宏观视角综合对比多个艺术乡建典型案例，以期涵盖各种类型，找到可推广的经验启示。

2　个案选择

通过阅读大量与乡建相关的论文、书籍和报道，并结合《碧山》丛书中总结的《中国乡村建设地图》，挑选了 61 个国内乡建案例，其中艺术介入乡村建设的案例有 15 个，中国乡建地图见图 1。将艺术乡建案例的地理分布和地域特点（地缘、文化、自然条件等）进行排列组合，依据个案样本“最大化变异”原则,尽可能涵盖全国东西南北各区及不同乡村类型，使样本组合最大程度涵盖各个方面[5]，并结合案例在文献中的出现频率及社会评价，挑选出 8 个典型个案进行分析比较案例挑选，见图 2。

图 1　中国乡建地图

Fig.1 The map of China rural constructio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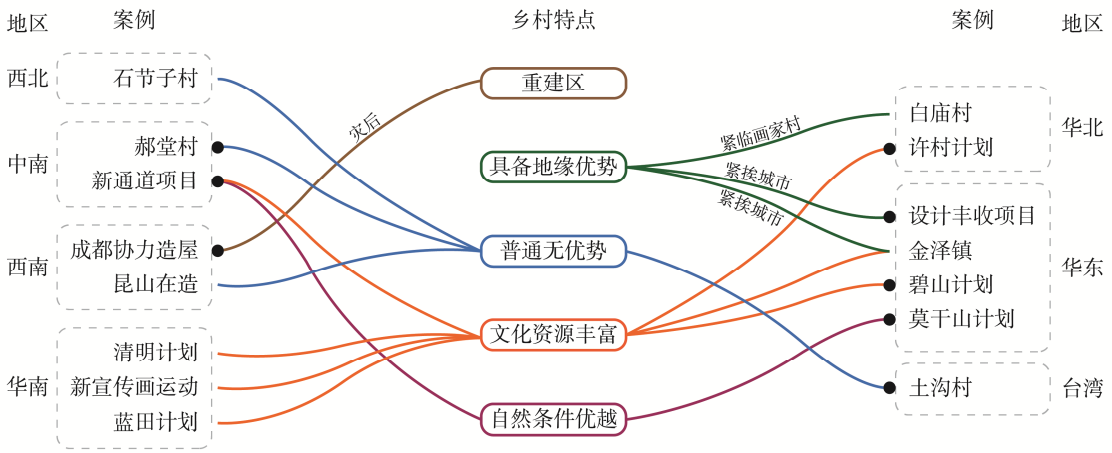

图 2　案例挑选

Fig.2 Case selection

3 个案对比分析

为了更直观地概述和对比多个个案,将个案概况以“5W+1H”模式呈现（Where 指位置，When 指时间，Why 指缘起，Who 指支持网络，What 指主要活动，How 指影响），个案概况见表 1。各案例按照发起方式、艺术家角色和目标 3 方面进行了对比分析，多案例对比分析见图 3。

表 1 个案概况
Tab.1 Case overview

案例	位置	时间	缘起	支持网络	主要活动	影响
1.许村计划	山西省晋中市和顺县许村	2007 年起至今	乡村精英范乃文邀请艺术家渠岩进行乡村改造	国内外艺术家、乡村精英、地方府、村民、村合作社、企业、高校等	重建文化信仰，修复改造老屋民居；制定保护文化和环境的乡约民规；开展国际艺术节、许村论坛等文化创新活动	乡村活力得到重塑，形成了乡土文化品牌效应
2.碧山计划	安徽省黄山市黟县碧山村	2011 至 20-16 年	艺术家欧宁和左靖试图重塑农耕文化和乡土文明，通过乡建实验实现乡建理想	国内外艺术家、作家诗人、本地政府、村民、城市居民、志愿者、高校等	“碧山丰年祭”系列活动；“黟县百工”手工艺调查；老屋改造；村民文育；发行出版物、举行展览传播乡建理念	当代艺术乡建典范，引起很大争议、激发当代乡建大讨论，乌托邦式乡建情怀与勇敢实践成为当代乡建宝贵财富
3.设计丰收	上海崇明岛竖新镇仙桥村	2009 年起至今	同济大学师生社会调研发现农村问题，本地村干部邀请参与乡村振兴	高校设计师生、村民、城市居民、本地政府、DESIS-China 等	有机农产品种植；农产品包装设计；农业大棚改造成公共交流空间；空房改造；农业体验和教育活动；手工艺培训；城市“屋顶农园”	有机农业种植理念得到村民认可并付诸实践；实现了城乡资源交换以及城乡交流互动和联动发展
4.莫干山计划	浙江德清县莫干山	2011 年起至今	设计师朱胜萱自投资金进行乡村改造实验	设计师、建筑师、艺术家、设计公司、村民、当地政府 、返乡大学生等	废弃场所民宿改造；建设有机农园；举办庾村文化市集；打造骑行文化;整理传播本地历史；开设书屋等	打造了莫干山特色乡村休闲旅游品牌；成为运用社会企业思维介入乡建的典型
5.协力造屋	中国、亚洲、非洲、美洲等国家和地区	1999 年起至今	建筑师谢英俊在台湾 921 地震后应邀建质优价廉的生态房	设计师、政府、村民、合作社、慈善机构、企业等	提供轻钢建筑框架，让村民通过换工方式基于本地建筑营造技法自主造房	具有环境性、经济性、社会性和文化性的“协力造屋”理念在中外各地灾后重建中广泛推广
6.郝堂村	河南信阳市平桥区郝堂村	2011 年起至今	孙君所在的乡建院受到区政府和村干部邀请开展郝堂村乡建项目	乡建院、三农专家、艺术家、村干部、村民、当地政府、村合作社、企业、NGO 组织等	内置金融互助；水系及污水整治；土壤修复；垃圾分类；老屋改造；育人教育；农产品及服务品牌打造	是少有的能够全面整体地进行乡村建设的项目，成果显著，成为以艺术为核心、多方参与的当代乡建典范
7.新通道	湖南通道、隆回等少数民族居住区	2009 年起至今	湖南大学发起、企业赞助，旨在实现乡村文化遗产数字化保护传播以及文创扶贫	高校师生、国内外设计师与艺术家、村民、地方政府、企业等	数字化手段记录传播文化遗产；文创扶贫；社区公共设施改良；公共生活重塑；儿童美育	文化遗产数字化促进了乡土文化保护与国际化传播；文创扶贫实践成果显著；多次国际展览传播乡土文化；获得国内外权威奖项肯定
8.土沟村	台湾台南市后壁乡土沟村	2001 年起至今	当地年轻人自主发起环境改造运动，几年后艺术力量介入村落营造	台南艺术大学师生、艺术家、村民、地方政府部门等	村落环境整治；村落空间艺术再造；打造土沟村美术馆	将一个无特殊资源的普通乡村打造成明星村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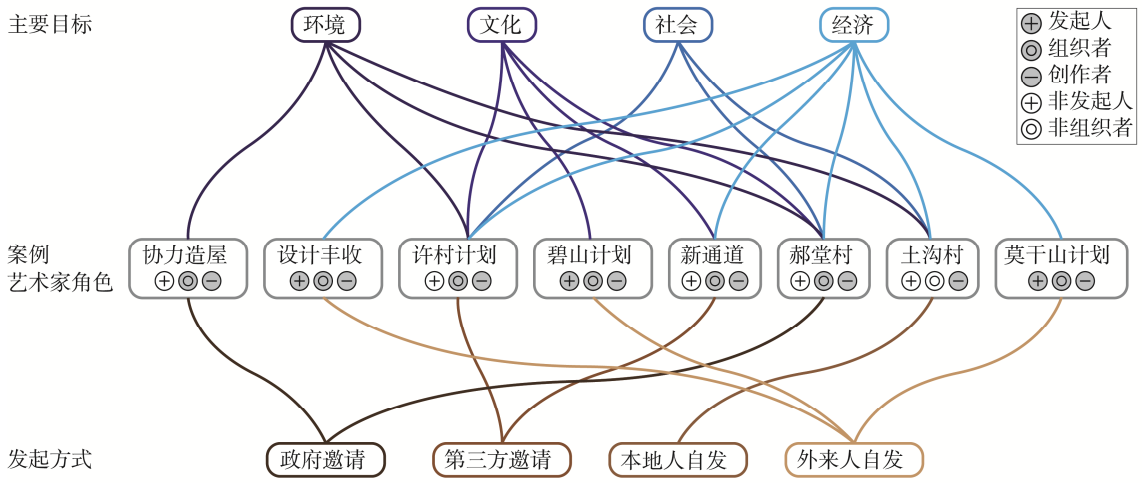

图 3　多案例对比分析

Fig.3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multiple cases

3.1　发起方式

艺术乡建发起方式分为自发和诱发两种，自发包括本地人自发和外来人自发，诱发包括政府邀请和第三方邀请。本地人自发的乡建，在熟人社会的村落更易获得理解和配合，如台湾土沟村通过社区自力营造凝聚民心，为后来艺术介入奠定了社会基础。外来人自发的乡建在获取信任方面需要一定时间，且受政府影响较大，第二届碧山丰年庆就因政府原因叫停。政府邀请的乡建，得到的财力和政策支持相对更多，谢英俊的“协力造屋”项目因受政府邀请，有财力和人力的支持，方便快速开展建设工作。第三方邀请包括个人或企业等的邀请，邀请人或组织通常会给艺术家提供坚强后盾。许村因为有和顺县前政协主席范乃文这样的乡绅精英支持而方便获得政府资源。企业在资金方面具有优势，且企业开放务实的市场视角能够与艺术的理想情怀互补，“新通道”项目就得到了美克美家等企业的大力支持。

3.2　艺术家角色

艺术家在乡建中的角色主要有创作者(Innovator)、发起人(Initiator)和组织者（Facilitator）。在任何乡建项目中，艺术家都要发挥作为创作者的本职工作，如土沟村的乡村空间艺术化，“新通道”项目中基于地域资源和手工艺的文化创意产品开发和公共游乐设施设计。作为发起人的艺术家通常怀有强烈的人文情怀和社会责任感，但在项目开展过程中会碰到各种各样的困难阻力，如“碧山计划”要克服当地政府和村民最开始的不信任，“莫干山计划”是朱胜萱用个人资金启动的乡建项目。作为组织者的艺术家则需要创建一个协同创新沟通网络，协调好各乡建参与力量的关切与矛盾，如地方政府、村干部、在地民众、本地合作社、企业、NGO、艺术圈人脉以及其他专业人士。同其他学科相比，艺术以其独特的艺术可视化组织手段在促进各方沟通方面独具优势[6]。

3.3　目标

艺术乡建的介入手段可总结如下：（1）乡村文化保护、传承与传播，如“碧山计划”中开展的“黟县百工”活动对当地手工艺进行调研与记录传播；“新通道”项目对花瑶族、侗族等少数民族文化遗产进行数字化保护与传播；《碧山》系列丛书详细记录了乡村文化百态；（2）建筑景观与公共设施的保护、改良与创新设计，如谢英俊在多地推广的“协力造屋”；“许村计划”中对村落古建筑的还原修复；郝堂村乡建项目中对老屋进行艺术化再造；“新通道”项目中设计了吊船、戏水设备等儿童户外游乐设施；（3）社区文化信仰与公共生活的重塑，如“许村计划”中举办国际艺术节与许村论坛；“碧山计划”在已经消失的传统仪式的基础上创造出“碧山丰年庆”的各种民俗仪式表演；“新通道”项目中设计师与当地村民基于侗族大歌进行戏剧编排表演；艺术家胡项成与岑卜村村民对传统端午节加以改良和创新、去芜存精，将不合时宜的礼俗“射柳”、“驱五毒”等环节改编成具有观赏性的舞蹈，实现了乡土礼俗和公共生活的重建；（4）社区教育，如新宣传画运动对国家农村政策的艺术化宣传；土沟村乡村美术馆的建立使本地居民了解村庄社区营造历史及其丰硕成果，从而激发强烈的社区自豪感与文化自信；“新通道”项目中开办留守儿童美术培训班，举办儿童画展，对儿童进行美术教育等；（5）旨在振兴乡村产业的文化创意产品设计及乡村旅游服务设计，如“新通道”项目中设计师与侗族织娘和花瑶族绣娘协同创造文创产品；“设计丰收”项目中进行农产品包装设计以及乡村农业体验服务设计等。

通过对上述艺术介入方式的进一步分析可得出艺术乡建有经济性、社会性、环境性和文化性 4 个目

标面向。经济性是指地方产业得到振兴；社会性体现在社区凝聚力得到增强，社区民众互助、互爱、互动，对社区有归属感与自豪感；环境性强调打造宜居安全的生活环境、完善的公共设施与服务；文化性指优良文化传统得到保护与传承，社区具有很强的地域识别特征。每个乡建项目往往有一个或几个目标面向，如“碧山计划”强调文化性，而郝堂村项目则全面兼顾环境性、文化性、社会性、经济性 4 个方面。当然，这 4 个目标面向有的是刻意而为的直接目标，有的则是间接效果，如环境的改良和艺术活动的推广，使很多村成为远近闻名的明星村，这间接推动了地方旅游业的发展，促进了本地经济增长。同时，乡建目标具有可扩展性，很多项目最初专注于环境性，随着环境改良运动中社区凝聚力的增强，又逐渐扩展到其他目标面向，经济性往往成为终极目标。如郝堂村最初设立环境性目标，倡导环境整治和垃圾分类；进而拓展到文化性和社会性目标，老宅艺术改造过程中艺术家与村民利用本地材料和传统土屋建造技法进行房屋建设，很好地传承了传统乡土建筑营造文化，还培养了村民的文化自豪感和互助精神；同时注重经济性目标，发展内置金融体系下的“夕阳红”养老互助合作社，既解决了农村养老问题，又可以为返乡年轻人提供创业贷款支持，还基于本地茶文化全面打造从茶产品到茶文化体验服务的乡土茶文化综合品牌。土沟村虽然是由环境自力营造的环境性目标出发，但是也成功地向凝聚民众的社会性、传承牛文化的文化性和发展观光旅游业的经济性目标扩展。

4 个案经验

当代艺术乡建围绕经济、社会、环境、文化 4 个目标面向，进行了一系列成功或失败的探索，为今后的乡建提供了重要的经验启示。

4.1 在地化

在地化要求设计要向“大地”回归[7]，包括对“人”的关怀，即本地居民是参与者与受益者；对“地”的应答，充分利用本地资源；对“时”的诠释[8]，可解读为对地方历史文脉的尊重。艺术家通过社区赋能教育培养村民的参与意识和能力，如土沟村培训当地小学生做志愿者并吸引年轻人回乡创业。在地化要求充分利用本地资源，如“设计丰收”将闲置农田大棚改造成社区交流中心，将空置的老屋设计成具有乡土特色的民宿等。当然在地化设计并不总是得到村民的理解，渠岩精心打造基于在地材料和传统建筑技法的老建筑改造样板房，却因价格和审美问题让村民无法接受。在地化还体现在对乡村历史文脉的尊重，如孙君在郝堂村设计民居时，十分注重当地习俗和文化，将主人房间门宽设计的比棺材大 15 ~ 20 厘米，考虑了葬礼时棺材的搬出不能破墙的习俗。

诚然，有文化和自然条件优势的乡建更易取得成功。但从社区营造的角度看，每个地方都是宝地，看似无用或处于劣向的要素加以改造就能从“负资产”转变为充满魅力的“正资产”，充分利用在地废弃物品与闲置空间是乡村振兴设计中的重要手段。如土沟村闲置的猪舍，在村民和台南艺术大学生共同改造后成为受欢迎的聚会场所，厕所屋顶由旧猪舍拆下的木板做成，废物利用的同时，变闲置空间为文化空间，强化参与者的成就感，让原被遗忘的角落成为受关注的中心。郝堂村的生活污水处理是当地难题，孙君利用当地荷花池的循环及修复功能,设计了人工湿地无动力污水处理系统，使生活污水流入荷花池，通过生态净化后灌溉农田并成为池塘水源的主要补充，打造了独具特色的村落水景观。

4.2 协同设计

协同设计是参与者共同探究问题和构思解决方案的过程。参与者积极表达和分享他们的观点，共同努力实现既定目标[9]。以“新通道”项目中的白水洞富硒米品牌设计为例，地方政府、企业、高校设计师、生物化学检测专家、知识产权专家、品牌建设与营销专家,特别是本地民众都充分发挥了各自专业知识与技能。在土沟村，村民和大学生协同为村里最后一头作为精神象征的水牛起厝（即盖房子），当用“土埆”（几十年前的建造材料）建牛舍的构想被提出后，老人们的记忆被唤醒，有人记得土埆的尺寸，有人能说出制作材料和做法流程，有人愿意担任现场指挥。谢英俊在协力造屋中负责设计房屋的“骨架”，其他则由村民完成。协同设计就像一个开放、互联的平台，能够充分激发参与者的能动性，让地方民众对所做之事、所创之物产生认同感、归属感和自豪感。相反，不遵循协同设计，可能会导致艺术家独挑大梁，剥夺村民主体话语权，降低村民信任感与知识技能贡献。如不少碧山村民由于缺少参与，认为“碧山计划”跟他们关系不大，甚至是外来人对他们的资源剥削。在不少艺术乡建项目中，艺术家主导设计的公共设施由于没有村民参与建造、缺少本地认同而遭废弃。

4.3 产业化

在乡建的 4 个目标面向中，文化性、社会性、环境性是乡建基础，而经济性是保证乡建可持续发展的最重要因素。普通民众往往比较短视，不关注文化、社会、环境等问题（至少在项目初期是这样），更关注能否得到经济实惠，因此艺术家必须尊重与理解村民的经济诉求。乡村建设中经济产业目标的实现，不同村落类型有不同的艺术介入方法：（1）文化资源丰

富型，指具有原生态文化、古建筑民居的村落，如碧山、许村和通道侗族村寨，适宜发展文化旅游业，如人文观光、文化体验、文创产品、非遗生产性保护等；（2）区位优势型，指城郊村或临近知名地的村落，可以利用地缘优势，打造特色乡土文化品牌，展示乡土生活方式的魅力，吸引附近的城市居民定期前来游乐互动。如“设计丰收”项目中通过生态旅游服务设计促成城乡互动、村落增收；（3）自然条件优越型，如莫干山通过艺术创新驱动发展民宿、生态农业体验和文化市集等形式的休闲旅游业；（4）普通无优势型，可通过艺术创新手段打造特色，如郝堂村通过环境整治和乡土景观打造，成功地从一个默默无闻的普通村落转变成全国闻名的明星村；土沟村通过村落空间艺术化改造成为知名村落；（5）重建区，包括灾后重建区和有房屋重建需求的普通地区，村民对房屋的首要诉求就是安全廉价。谢英俊在“协力造屋”项目中设计的民居让农民的建房成本降为一半，同时还推动了本地轻钢产业和建筑行业的发展，拉动了当地就业。

艺术乡建产业化也面临不少问题：（1）持续运营问题，如碧山丰年庆中本地村民身着原始的稻草装表演祈求丰收的祭祀舞蹈，集中展示黟县 34 项民间手工艺，的确提高了本地知名度，增加了居民收入，但艺术节过后一切都恢复原样；（2）文创产品的开发过程容易变成艺术家对本地资源的剥削，同时在目前也面临诸多商业化问题，即使是在注重与村民协同创新、能够给村民合理经济回馈的优秀案例中，文创商品也由于价格高昂，在缺少知识产权保护、民众审美普遍偏低的现阶段不易取得市场成功；（3）艺术介入有时成为剥削割裂地方社区的原罪，如作为优秀艺术乡建案例的“莫干山计划”中的一些高端休闲地沦为外来富人的享受空间，缺少与本地社区的联系，受益的是外来投资者和旅游休闲者而非本地村民。这并非是艺术家本意，违背了设计艺术“以伦理良知为精神触点”、“引领普众伦理践行”的职责[10]；（4）乡建产业成果要见成效需要长期过程，日本越后妻友大地艺术节持续了 17 年，到将近第 10 年才脱离政府的财力支持。

5　结语

艺术作为一种全新的乡建介入手段，以其在造物设计、力量整合和文化保护传播等方面的创造力优势及介入方式的多样性而别具一格，目前相关研究较为匮乏。本文首先溯源中国乡建历史，根据“最大化变异”原则挑选艺术乡建典型案例，并通过多个案对比分析，总结艺术乡建在发起方式、艺术家角色和目标上的异同，最后提出艺术乡建的有效经验：在地化、协同设计和产业化。由于乡建的复杂性，并非遵循这 3 个经验就能取得乡建成功，但是可以更加有效地实现乡建的 4 大目标(经济性、社会性、环境性和文化性)。本研究不足之处在于没有明确个案的外推范围，没有深入实地调研所有个案样本，这都需要更加深入的后续研究。

参考文献：

[1] 何宏光. 新农村建设再反思与展望——新时期农村社会建设的路径探索[J]. 现代经济探讨, 2014(6): 15—19.
HE Hong-guang. Reflection and Prospect of the New Rural Construction: the Exploration of Rural Social Construction in the New Era[J]. Modern Economic Research, 2014(6): 15—19.

[2] 潘家恩, 杜洁. “现代梦”的别样回声: 乡村建设的资源与矛盾[J]. 开放时代, 2011(3): 70—83.
PAN Jia-en, DU Jie. The Different Echo of "Modern Dream": Resources and Contradictions in Rural Construction[J]. Open Times, 2011(3): 70—83.

[3] 张富利. 新乡村建设运动与社会转型时期的乡土复兴[J]. 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4(4): 181—185.
ZHANG Fu-li. The New Rural Construction and Home Village Revival[J]. Journal of Central South University(Social Science Edition), 2014(4): 181—185.

[4] 祝彦. 救活农村: 民国乡村建设运动回眸[M]. 福州: 福建人民出版社, 2009.
ZHU Yan. Saving the Rural Areas: A Review of the Rural Construction Movement in the Republican Period[M]. Fuzhou: Fujian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2009.

[5] 王宁. 个案研究的代表性问题与抽样逻辑[J]. 甘肃社会科学, 2007(5): 1—4.
WANG Ning. Representational Problem and Sample Logic of Case Study[J]. Gansu Social Sciences, 2007(5): 1—4.

[6] 埃佐・曼奇尼. 在人人设计的时代[M]. 北京: 电子工业出版社, 2016.
MANZINI E. When Everybody Design[M]. Beijing: Electronic Industry Publishing House, 2016.

[7] 张海林, 储雅珩. 新型城镇化背景下民俗艺术的保护与传承[J]. 包装工程, 2016, 37(18): 5—8.
ZHANG Hai-lin, CHU Ya-heng. Protection and Inheritance of the Folk Art in the Background of New-style Urbanization[J]. Packaging Engineering, 2016, 37(18): 5—8.

[8] 张新霓. 台湾城市公共空间在地实践设计研究[D]. 北京: 北京林业大学, 2015.
ZHANG Xin-ni. Research on Local Practice of Urban Public Space Design in Taiwan[D]. Beijing: Beijing Forestry University, 2015.

[9] 布鲁斯・布朗, 理查德・布坎南, 卡尔・迪桑沃. 设计问题[M]. 北京: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6.
BROWN B, BUCHANAN R, DISALVO C. Design Issues[M]. Beijing: Tsinghua University Press, 2016.

[10] 熊承霞. 设计治疗对社会德失的价值意义[J]. 包装工程, 2016, 37(22): 81—86.
XIONG Cheng-xia. Value Meaning of Design Treatment for Society Loss[J]. Packaging Engineering, 2016, 37(22): 81—86.